

# 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关系

虞崇胜 王贤胜

---

在土地革命时期,蓬勃兴起的苏维埃运动,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中国苏维埃运动虽然基本上依据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的框架和模式而兴起的,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客观历史环境下,却为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然而,正是由于苏维埃运动模式的影响,又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求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迟滞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和发展。直至1935年以后,随着中共政策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的转变,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才最终被确定下来。

---

中国苏维埃运动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创造,而是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的产物。

关于在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组织和实行苏维埃制度的问题,共产国际二大有所论及。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报告》中指出:“苏维埃这种组织一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的条件”,落后国家或殖民地的共产党“应该普遍宣传关于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的思想,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他们就应该立即设法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列宁并且预见到:“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对于殖民地革命中如何实现苏维埃的问题,列宁除了阐明无产阶级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之外,没有规定具体的模式和框架。相反,他强调指出:“这不可能预先指出。实际经验会给我们启示的”<sup>①</sup>。列宁的上述指示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事隔7年,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后,列宁上述指示的精神被纳入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之中,从而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斯大林在1927年4月21日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宣传提纲、7月28日写的《时事问题简评》以及8月9日发表的《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的演说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三阶段论”。

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主要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

阶级。“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革命的主要锋芒是国内封建势力,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七·一五”政变后,汪精卫集团转入反革命营垒,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了革命,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就只剩下农民和城市贫民了。

斯大林提出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后,由于与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现实发生了巨大的矛盾,中国革命形势非但没有出现组织苏维埃所需要的革命高潮,相反处于明显的低潮,加上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仍然没有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幻想着组织“左派国民党运动”,以及托洛茨基反对派当时正在利用组织苏维埃来攻击斯大林继续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没有马上提出组织苏维埃的问题。中共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议案》和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中,都批评了试图建立苏维埃的作法,认为“在目前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不适宜的”<sup>②</sup>。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苏联《真理报》7月26日的社论中,虽然指出“国民党业已出现的重大危机已将建立苏维埃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但对国民党还是抱有幻想,说“争取国民党的斗争结局如何,尚未得到最后答案。”两天后的7月28日,斯大林在发表的《时局问题简评》中指出:“在几个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的革命口号”,但又指出“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sup>③</sup>。

可是,当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现“促使国民党革命化”的意图得不到成果,国民党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很快改变了原来的策略。8月9日,联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中说:“当前时期中国革命的特征是,在其遭到严重失败的同时,发生了各派力量的激烈改组,在各派力量的改组过程中,工农和城市贫民结成反对一切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同盟。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转入了自己发展的更高阶段,即直接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斗争的阶段。”“既然共产党促使国民党革命化的意图得不到成果,既然不能将该党转变为广大工农群众的组织,并使其实现民主化,而另一方面,革命势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将苏维埃这一宣传口号变为直接斗争的口号,并着手组织工农和手工业者苏维埃。”<sup>④</sup>这就是说,在8月上旬,联共中央已经放弃争取国民党左派的策略,而决定在中国实行建立苏维埃的计划了。

然而,中共中央的策略的转变则比联共中央要晚一个多月。8月中旬,中共中央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在肯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的同时,仍然强调:“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sup>⑤</sup>。8月23日,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中,批评了湖南省委关于放弃国民党旗帜,立即组织工农兵苏维埃的建议,指出:“政权形式,已在政治决议案中说明,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阶段。”“到了第三阶段才是国民党消灭苏维埃实现的时候,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了,这是不对的。”<sup>⑥</sup>

直到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根据国民党的旗帜在群众中成为“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的形势,才决定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取消了8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实行暴动的条款,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

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sup>⑦</sup>。至此，中共中央就将苏维埃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接受下来，并把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来抓了。

由上可知，中国苏维埃运动基本上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依据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的框架和模式而兴起的，并不反映中国革命发展的迫切需要。

## 二

历史的发展是纷繁复杂的，往往与人们的主观判断不尽一致，出现许多人们意想不到的结果。大革命失败后，虽然在中国立即掀起苏维埃运动并不是中国革命发展的迫切需要，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尚未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极端重要性而首先举行武装暴动、推翻旧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运动的时候，苏维埃运动又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

自1927年8、9月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决定组织苏维埃政权后，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迅速开展起来。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统一中国，造成新中国——工农劳动平民会议（苏维埃）的中国。”<sup>⑧</sup>10月24日，中央第13号通告指出，南昌起义在政治上的错误是“没有预备去建立工农贫民的政权，没有深切觉着自己应当代表工农贫民去行使权力，却只要‘继承国民党的正统’。”<sup>⑨</sup>11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指出：“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兵独裁制的政权。”<sup>⑩</sup>11月17日，中央常委通过《广东工作计划议案》，命令广东省委急速发动全省暴动，“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sup>⑪</sup>。

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广州暴动计划的制定，加快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步伐。11月中旬，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建立。12月11日，广州起义后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她的建立，受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但是，广州起义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很快遭到失败，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仅存在3天就夭折了。

广州起义的失败，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史上一次重大转折。尽管中共中央仍然坚持通过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而取得全国政权的策略，但也开始认识到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必须有待四周农村展开武装斗争，形成割据局面，并向中心城市包围，才能取得胜利。广州起义失败不久，广东省委就曾指出：今后广东党组织的任务，“不是马上在广州暴动，而是要东、西、北各县极力发愤暴动，形成割据局面，并向广州包围，直到时机成熟，然后在广州作第二次暴动，夺取全省政权。”<sup>⑫</sup>12月28日，广东省委代理书记李立三在给中央的信中也认为，今后广州暴动的策略，应“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展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sup>⑬</sup>这些想法和建议，虽然没有实施，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有一定启发的。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正是在“工农贫民士兵暴动”、“推翻一切反动政权”、“一切政权归苏维”的口号下，从1927年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农村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并且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点燃了农村苏维埃运动的星星之火。以下我们将重点介绍一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以说明苏维埃运动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关系。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时候，乃至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初期，对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认识也是不明确的。但是他对于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搞武

装割据,则是十分重视的。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就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中共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被派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8月18日,他在湖南省委讨论秋收起义计划时指出,秋收起义的目的在于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党应当以主要力量从事武装斗争,以枪杆子夺取政权,以枪杆子推动土地革命。8月20日起草的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要求在秋收起义中建立苏维埃。当时由于中共中央恪守共产国际只许宣传苏维埃而不准建立苏维埃的训令,在8月23日复湖南省委信中,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进攻长沙途中遭到挫折后,汇集到浏阳县文家市。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向湘赣粤边区农村进军,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正是在领导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不断总结建设和巩固工农苏维埃政权的经验教训,在1929年5月至11月间写下的《中共红四军军委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关于红军情况的报告》、《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井冈山的斗争》等报告和决议中,系统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苏维埃政权的理论。过去,许多人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苏维埃政权的理论,说成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标志,这是不确切的。准确地说,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苏维埃政权的理论,只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发展史上的初期阶段,并不是其形成的标志。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如:中外历史上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经验,而各农村根据地初创不久,来不及系统总结经验;当时各农村根据地都处于困难时期,显示不出其优于城市斗争的特点来;当时的农村斗争还不足以证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锻炼成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等等,毛泽东还不可能系统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以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sup>①</sup>

从上述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实践,以及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领导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是从领导农村苏维埃运动开始的。没有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实践,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城市和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找到符合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苏维埃运动就为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

### 三

说苏维埃运动的兴起,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造了条件,并不是要为苏维埃运动评功摆好,而只是实事求是地说明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苏维埃运动的实践中逐步找到的。其实,正是由于苏维埃运动模式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苏维埃运动又迟滞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发展。

首先,从对大革命失败后阶级关系的分析看。按照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的公式,在苏维埃阶段内,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脱离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就只剩下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了。在这个阶段里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工农民权独裁制”。囿于斯大林的这种公式,中共中央对中国的阶级关系作出了脱离实际的错误分析。中共

五大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认为，蒋介石及其部下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决非个人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点，是“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sup>⑨</sup>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同志书》也指出：由于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和共产党影响的扩大，“使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的阵线而走入了反革命的营垒”<sup>⑩</sup>。鉴于上述分析，1927年11月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任务决议案》宣布：“为着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工人阶级不能不领导农民根本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sup>⑪</sup>。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决议更强调说：中国革命“只有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sup>⑫</sup>这种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混同起来，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统统作为最危险敌人的错误认识，就成为了指导苏维埃运动和制定党的策略方针的主要依据。依据这种错误认识而开展的苏维埃运动，自然就阻滞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第二，从对革命性质的分析来看。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关于这一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是清楚的，并且多次强调过。但是，依据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的公式和十月革命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经验，一旦进入苏维埃阶段，就必然要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样，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与社会主义性质的苏维埃就发生了矛盾。为了缓解这种矛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先是强调了中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转变”性。1927年8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中指出：“中国革命，现在正在自己的发展之中，经过极危险极剧烈的转变关键”；“工农兵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即是保证工农民权独裁制直接进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sup>⑬</sup>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把斯大林关于中国苏维埃的观点连贯起来，系统地提出了所谓“无间断革命论”，并在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获得通过，成为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理论基础。在“无间断革命论”指导下，各地闻风而动，组织了一大批不顾客观条件的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和暴动，而起义和暴动中最时髦的口号就是建立苏维埃，诸如“即使组织一两天苏维埃也是好的——就算暴动没有相当胜利的希望”等论断，也颇为盛行。可见，在上述理论指导下的苏维埃运动，必然要阻滞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探索。

第三，从对革命形势的分析来看。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能否组织苏维埃，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看是否具备“直接的革命形势”，即革命潮流的高涨。可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明显是低潮。而自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后，各地已经掀起了苏维埃运动。怎么办？为了适应开展苏维埃运动和推行左倾盲动主义政策的需要，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编造了一系列关于革命形势高涨的神话。在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案说：由于存在着中国社会的总危机与农业危机、工商业危机，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的急进，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内部的冲突，所以，“现在中国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为了发动广州起义，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鼓动说：广东统治阶级的力量，“已经动摇崩溃”，工农革命情绪“已至高度的狂热”，革命确实是“深入而扩大，“不仅没有失败，而且不是停顿。”<sup>⑭</sup>广州起义前夜，斯大林在联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对中国局势的判断是：革命运动已“推上了更高的阶段，只有瞎子和懦夫才会怀疑中国工人和农民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sup>⑮</sup>广州起义失败之后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低落吗？》一文中仍然断言：“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sup>⑯</sup>这种对革命形势的主观主义估计，不但直接影响了苏维埃运动，而且严重地干扰了全党对正确的革命道路的探索。

第四，从党的工作中心和苏维埃运动的重心来看。中国苏维埃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城市中

心论”的影响。1927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规定：“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就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当这些中心地点还没有被革命暴动占据以前，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地拒绝组织苏维埃，这是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sup>②</sup>临时中央政治局11月会议也指出：“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sup>③</sup>。12月，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说：“湖南总暴动的中心在政治上说当然是长沙。”“省委总暴动的布置应当以长沙为中心。”<sup>④</sup>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仍然说：“虽然广州苏维埃政权只维持三天便失败了，党的任务依旧是可以在一省或数省之中，领导工农兵群众为夺取政权而奋斗，不应当坐待全国革命之最后胜利。”<sup>⑤</sup>

不过，广州苏维埃的猝然失败，各地秋收暴动后夺取中心城市的相继失利，以及海陆丰、鄂豫边、赣东北等农村割据局面的竞相出现，也给予中共中央某些负责人以启示，推动了他们对中央暴动政策的再思考。1927年12月瞿秋白发表文章说：“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不能成为一个整个阶级势力，他们内部分裂冲突而没有组成全国中央集权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所以，客观上革命斗争的形势，也就形成各省农民此起彼落，比较散乱而不相呼应的暴动。”而要使各地游击战争坚持下去，“便必须发动群众自觉的斗争，使他们得到政权和土地”，“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sup>⑥</sup>。1929年3月17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曾正确地指出：“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种直接革命的形势。”针对湘鄂西红军拟向下游发展，将来以常德或宜昌为目的地的计划，他指出：“这种计划还太大而不切实。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越过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sup>⑦</sup>1929年9月，周恩来在《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又提出了“先有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思想。<sup>⑧</sup>1929年3月2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和福建省委的报告中，第一次向党中央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sup>⑨</sup>上的建议。4月5日，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中，又进一步提出通过发展江西农村根据地，造成“向南昌包围的形势”<sup>⑩</sup>的战略思想。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指出了它们“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从而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雏型。

可是，1930年上半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党内又出现以李立三为代表的过高估计革命形势，强调中心城市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潮。李立三等对毛泽东等人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进行了严厉批评和指责，说什么“想以‘农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sup>⑪</sup>。于是，李立三等人制定了夺取武汉的总暴动计划，要求上海、南京、广州、天津、北京等中心城市组织武装起义进行配合，口号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结果使党在各方面的实际工作遭到很大的损失。

继李立三而起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鉴于当时时局的艰难，没有马上提出攻打中心城市，但仍是坚持城市中心的观点。1932年初，当红军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以及“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出现高潮的时候，王明等被形势冲昏了头脑，说什么：“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不同了”，“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sup>⑫</sup>。因此，他们要求红军攻取赣州、南昌、杭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湘鄂赣各

省的首要胜利”。结果又一次使党在白区的工作和红军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由上可见，中国苏维埃运动基本上是按俄国城市苏维埃的模式而铸造的，在阶级关系、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道路诸方面都与实际不相符合，严重地阻滞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探索。尽管各地农村苏维埃在实践中曾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这并不是苏维埃运动模式的功绩，恰恰相反，这是冲破俄国苏维埃模式，摆脱共产国际和“左”倾领导者的干预和影响的结果。

#### 四

如上所述，随着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好转，党内“左”倾思想又有所发展。他们过分地夸大统治阶级的危机，忽视敌强我弱的特点，试图在短期内实行城乡工农革命的配合，夺取一省数省革命的首要胜利，进而实现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为此，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干预。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于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决议提出了一系列“左”倾冒险主义的策略和措施。1930年9月12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会后，中共中央根据土地革命是否发展和有无群众基础；是否有强大的红军存在；是否便于向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发展等三个条件，将全国革命根据地划分为六个区域：苏维埃中心区；鄂豫皖特区；湘鄂西特区；闽粤赣特区；赣闽皖特区；广西左右江特区。并决定“一苏大”将在苏维埃中心区召开。

1931年11月7日，时值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个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完全对立的工农民主政权的诞生。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管理国家的最初尝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当时正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之下，大会通过的宪法草案及土地法、劳动法等文件都包含着“左”倾错误的内容。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两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提出苏维埃的基本任务是“以革命战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巩固与发展工农民主专政，并准备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去。”<sup>⑨</sup>当前的任务是：“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把苏维埃运动推到全国去”，“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灭亡中国的阴谋毒计。”<sup>⑩</sup>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虽然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是，由于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的形势下召开的，因此不可能担负起总结经验教训和纠正“左”倾错误的使命。1934年10月，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中央红军被迫撤出苏区，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中国苏维埃运动遭到严重挫折。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犹如久旱之后下了一场透雨，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新的生机。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长期统治，使中国共产党人才有可能对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进而制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政策和策略。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及会后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具体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提出了人民共和国口号。1936

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又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对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了具体说明。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表示,苏维埃政府将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此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首先实行了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的转变。2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名为陕甘宁特区。5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通过《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法规,正式确立了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制度。9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最终完成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的转变。

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这是极大的转变。这个转变,不但适应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需要,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认识。

如前所述,1930年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已经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雏型。但是,这个理论并不成熟。毛泽东本人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对于全国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的认识也还不充分。而且毛泽东等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并未被党中央所接受。1931年至1934年间,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和苏维埃运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探索几乎中断,中国革命也几乎陷于绝境。直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才有可能继续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概括。

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通过总结中外革命战争的经验,特别是北伐战争和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不同于苏联内战和我国北伐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为最终确定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全面深刻地论述了坚持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对于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他说:“敌人占领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敌据城市以对我,我据乡村以对敌,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吗?答复:有困难,但是能够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根本不同的特点。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而中国则不同:第一,中国是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农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第二,中国是大国,失去一部,还有一部,有活动的余地;第三,中国有了新的政党、军队和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总之,在今日殖民地大国的中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sup>⑧</sup>

11月6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再次指出:由于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sup>⑨</sup>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在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

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sup>⑨</sup>至此，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才被中国共产党人最终确定下来，其时间与最终放弃苏维埃运动的时间相差无几。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表明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曾结下不解之缘，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认真地清理这种关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将会给我们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以许多宝贵的启示。

#### 注 释：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35—336页。
-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 ③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22—323页。
- ④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44—345页。
-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89—290、302、313、326、333、76、240、313页。
- ⑩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 ⑪⑬ 《广州起义》第23、154页。
- ⑫ 《中共广东省委致东江特委的信》，《中共东江特委档案选编》第2—3页。
- ⑬⑭⑮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9、14—18、32页。
- ⑯⑰⑱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146、133页。
- ⑲ 《中共中央文集选集》第4册，第170页。
- ⑳ 《中央通讯》第2期，1927年8月23日出版。
- ㉑ 《布尔什维克》第1卷，第9期。
- ㉒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42页。
- ㉓ 《中共中央关于立即组织暴动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12月15日。
- ㉔ 《广州暴动之意义和教训》，1928年1月3日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案。
- ㉕ 瞿秋白：《武装暴动问题》，《布尔什维克》第1卷第10期，1927年12月19日。
- ㉖ 《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 ㉗ 《前委致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
- ㉘ 李立三：《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1930年4月2日。
- ㉙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
- 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4、25日。
- ㉛ 《毛泽东的开幕词》，1934年1月22日。
- ㉜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周刊第57期，1938年10月。
- ㉝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第2版，第542、635页。

（责任编辑 吴友法）